

辛亥革命与世界潮流

○熊月之



熊月之 生于1949年12月。1981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上海城市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研究。出版《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代革命文豪章太炎传》等多部著作。主编《上海通史》《海外上海学》等多部著作。发表近代史、上海史方面的论文百余篇。

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史林》杂志主编等。

革命党人顺应了世界潮流

回顾一百年前那场波澜起伏的辛亥革命，人们不难发现，它与汉朝取代秦朝、唐朝取代隋朝、清代取代明朝，很不一样，没有发生战事连年、血流成河的残酷局面。

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先是湖南、陕西、江西响应，宣告独立，随后山西、云南跟上，再后是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福建等省群起独立。不到两个月，清朝统治便已土崩瓦解。四个多月间，改朝换代已经完成。推翻清朝统治的全过程中，全国仅有两三个城市发生短时间的局部战争。革命风潮来势之猛，清廷统治覆灭之速，出乎统治者的想象，也出乎革命党的意料。

在很多地方，清政府军队与革命军都没有怎么交火，便已溃败，其局面让后人难以想象。

比如：武昌起义爆发后，起义军炮轰湖广总督署衙。署衙周围全是一丈多高的围墙，又与守军司令部为邻，按理说是易守难攻，短时间内没有大问题。但是，湖广总督瑞澂全无底气，见一些地方起火，便心惊胆战，马上叫人在署衙墙根打一个洞，带着家小从洞里爬出，躲到停在长江里的一艘军舰上。于是，群龙无首，土崩瓦解。

再如湖南长沙，巡抚余诚格本是翰林出身，好练习静坐功夫，但不善管理军政大事。当有关人员一次又一次向他报告有起义军攻打长沙时，他神定气闲，一次又一次地回答：“没有的事，再打听罢”。等到起义军攻到巡抚衙门，毫无防备的卫队立即投诚。这时，余诚格出来说：“弟兄们，我们都是汉人”，未作任何抵抗就投降了。他在抚署后院挖了一个洞，逃入某洋行，然后躲避上海租界。

在陕西西安，起义爆发时，一班大小官员正在开会，听到枪声四起，立刻作鸟兽散。护理巡抚钱能训，先是慌忙地躲在一个随从家里，用手

枪自杀未死，然后被送交军政府，受到优待。起义士兵在进攻军装局时，枪里并无子弹，只是将军帽掷向空中，大声喊杀，蜂拥而入。军装局守军毫无准备，只得从后门溜走。布政使衙门被起义军顺利占领，库存的七十多万两银子分毫未损，全归民军所有。

在江西九江，起义军号炮三声，臂缠白布，就向道府两署进攻。九江道保恒与知府濮良先后携眷逃跑。南昌方面，巡抚冯汝骥得知起义风声，慌忙从后门逃走。

在山西大同，起义军将知府辕门打开，高喊：“弟兄们！快往里冲啊！”总兵王得胜从梦中惊醒，急忙越墙而逃，知府李德炳、知县葛尚德则逃入耶稣教堂。最有戏剧性的是，起义军在攻打总兵衙门时，所放的信号，并不是真的火炮，而是高升鞭炮，其他革命党人在城内各处表示响应的信号，也是鞭炮，其时的情景是鞭炮声、喊声、杀声混成一片，大同就是在这样的混乱声中光复了。

在上海，起义枪声打响以后，道台刘燕翼一溜烟地逃入位于租界内的洋务局，知县田宝荣亦闻讯逃走，他们都没有作任何抵抗。

在苏州，全城光复，没费一枪一弹。江苏巡抚程德全通过策反和平反正的，成为第一个以和平方式站到民军方面的正省级官员。上海民军只去了五十来人，到苏州去做工作，因此史称五十人光复苏州。

在杭州，起义军进攻浙江巡抚衙门，只开了几枪，掷了几个炸弹，就攻进去了。巡抚增韞从后围墙逃走，躲在马房里，被起义士兵俘虏。从进攻抚署，到宣布安民告示，前后不到四十分钟，全城鼓掌，皆称神速。杭州将军德济、协领贵林均缴械投降。

平情而论，那时候，清朝军队（特别是新军

六镇)虽然与西方列强打仗不行,但与革命党想比,其实力还是明显占据上风的。那么,清朝各地军队、官员在事变中的表现,为什么那么阖茸,畏葸?为什么那么不堪一击?

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了不少答案,包括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统治者在人民心目中早已失去威信,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以为,光有这些答案还不够。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要考虑更广阔的国际背景,更独特的时代特点,更深刻的文化因素。简单地说,清朝末年,中国不光在经济方面,已受西方很大影响,思想文化方面,也已经受到西方的深刻影响。西方的民主、民族、进化等观念,已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种潮流。清朝统治者对这股潮流,没有清醒的认识,没有正确的应对方略。革命党人正是顺应、利用了这股潮流,打垮了清朝。

世界潮流的思想内涵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是孙中山先生时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他时常书写条幅的内容。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潮流。那么,清末民初,或者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世界潮流,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即民主主义、民族主义与进化论。

所谓民主主义,在孙中山那里被称为民权主义,与此相关联的有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等观念。其核心是强调人民的价值,人民的权力,与君权相对。自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这一观念在全世界传播、弥漫,激起一阵又一阵反对君主专制主义的浪潮。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虽然与欧洲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但那也是可有可无的联系,从洛克、卢梭一路下来的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等民主思想,对中国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强行卷入全球化进程,再也无法循着先前的轨道踽踽独行。那些与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针锋相对或格格不入思想观念,通过来华人员(包括传教士、商人与其它外国人)、外出人员(出使人员、商人、游历人员、留学生)、报刊杂志,或多或少、或急或缓、有意无意地传入中国,其影响如浓雾罩山,润物无声,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卢梭的《民约论》,在1898年上海就有中文译本《民约通义》出版,以后又出版了《路索民约论》等多种译本,孟德斯鸠阐述三权分立原则的名著《论法的精神》,在1902年就有《万法精理》译本问世,以后又有严复译的《法意》出版。阐述自由主义原理的经典著作,约翰·密勒的《自由论》,在1903年就有名为《自由原理》译本出版,后来又有严复译的《群己权界论》出版。至于体现这些思想

观念的论述,在1900年至1911年的形形色色报章杂志中,可以说是满坑满谷,铺天盖地。这些思想观念猛烈地、持续地、深刻地冲荡着传统的专制主义,引发人们的焦虑、思考,促使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正如邹容在《革命军》中所表达的那种感情:

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若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

所谓民族主义,在不同时代、不同学者那里有不同解释,据说至今已有二百多种不同含义的民族主义,其核心理念是指将自我民族作为社会活动主体而置于至上至尊地位考虑的思想,目的在于为一个社会群体谋取和维持自治及个性。法国大革命、十九世纪希腊独立战争、意大利独立战争,都是民族主义产生影响的重大事件。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在空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民族主义在中国激汤磅礴。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认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国家而已。”孙中山对民族主义有许多论述,其内涵在民国以前与以后有所不同,在晚清主要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争中,严复、汪精卫、章太炎等都有许多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世界各地各民族反对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格外关注,翻译出版了《飞猎滨独立战史》、《义大利独立战史》、《苏格兰独立志》、《佛国革命战史》、《美国独立战史》、《希腊独立史》、《印度灭亡战史》、《波兰衰亡战史》、《比律宾志士独立传》等众多书籍。

民主与民族这两大主义,在晚清发生了极大的影响,梁启超称其为中国人的精神自觉。他说:

自觉,觉些什么呢?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这两种精神,原是中国人所固有;到最近二、三十年间,受了国外环境和学说的影响,于是多年的潜在本能忽然爆发,便把这回绝大的自觉产生出来。

所谓世界潮流的形成,需要两个前提,一是世界各地联系密切化,二是不同政治体制的可比较性。

十五世纪以前,虽然亚洲、欧洲、美洲、非洲、澳洲等地都有人类居住、生活,都有文明演化,但各大洲呈分离状态,相对孤立发展,那时只有全球各地的历史,不存在全球史,不存在世界潮流。地理大发现以后,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轮船、火车的发明使用,电报、电话的发明使用,印刷术的进步,大量报刊、书籍的出版,资本主义由欧洲向南北美洲、非洲、亚洲、澳洲的扩展,这才将世界各地日益紧密地联为一个整体。

这样,世界各地联系密切以后,为将中国与西方进行比较提供了空间依据,民主主义否定了专制主义,民族主义否定了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进化论将不同的政体联成一个阶梯。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相互支撑,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话语强势。

所谓潮流,是从一个地方流向另一个地方,有一定方向。人类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创造的各种不同政治体制,各自都有其产生与存在的理由,本来并无高下优劣之分。自从进化论面世以后,不同政体之间,不同政治观念之间,才被用一条进化链条连接起来。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不单有性质的不同,且有程度的高低,品质的优劣。1904年发生日俄战争中,日本是小国,俄国是大国,日本是立宪国,俄国是专制国,战争的结局日胜俄败,这似乎提供了立宪高于专制的确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05年中国要求立宪的呼声陡然高涨。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端方等均吁请朝廷考虑立宪问题。迫于舆论压力,慈禧太后在这年8月派戴鸿慈、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考察的实质,就是进行不同政体的比较,看看宪政是否真的高于专制。考察的结论一边倒。端方等人说得最透彻:以中国与欧洲比,中国贫弱,欧洲富强,但欧洲各国,土地不如中国大,甚至小于中国数十倍,人民不如中国多,甚至少于中国数十倍,但其兵力之强、国家之富有超过中国数十乃至数百倍者,这是什么道理呢?道理在于:“乃知其所以富强者,不当于其外交之敏捷求之,而当于其内政之整理观之。夫世固未有政治不修而其国能富、其兵能强者;亦未有内政不修而外交能制胜利者。欲判其内政之能修与不能修,此不必问他,但问其政体之为何而可以判之矣。”东西各国所以富强,就在于其实行立宪政体,中国之所以贫弱,就在于中国仍用专制政体。当此霸权主义时代,中国若想富强,“除采用立宪政体外,盖无他术矣”。这个结论背后的逻辑,就是进化论。

平情而论,端方这番话,如果从思想史角度看,实在卑之无甚高论,此前人不知多少人说过多少遍。郑观应早在十多年前就说过:“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强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

始矣!”郑观应是普通民间知识分子,他的话会有影响,但相当有限。戴鸿慈、端方等人,则是朝廷大员,是慈禧太后信得过的重臣,这番话从他们嘴里说出,份量就大不一样。更为重要的是,这番话在十几年前说与这时候说的质量也不一样。在日胜俄败的背景下,这番话反映的是世界潮流。

在潮流面前,清朝统治者找不到反驳的理由。1906年,清廷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意味着在意识形态方面从此处于完全被动状态。从1909至1910年,立宪派之所以能够连续发起要求召开国会的三次大请愿,涉及的人数动辄数十万,得到相当多的总督巡抚的支持,具有相当广泛的民意基础。考其原因,就是这些请愿者高举的旗帜,是官方已经正式认可的价值,政治正确。所以,清廷之亡,自宣布预备立宪以后,就已植根。

新式媒体报刊的关键作用

所谓世界潮流,以舆论宣传为形成之利器。没有报纸、杂志、电话、电报作为信息传递的载体,就无所谓世界潮流。以报纸杂志为核心的新式媒体的出现,是近代世界与前近代世界的一个根本性的不同。能否自觉地运用新式媒体,是近代政治变革与前近代政治变革的一个根本性差异。

在辛亥革命过程中,革命党人牢牢地掌握着舆论宣传的主动权与进攻性,在海内外有几十份革命刊物,单在上海就有《苏报》、《民呼日报》、《民立报》等十多种。早在1900年,孙中山就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

面对着如涛似浪的革命宣传,清廷虽然想方设法禁止,成效不大。清政府费了好大的力气才禁了《苏报》,但紧接《苏报》后面,《国民日报》就出版了,号称“《苏报》第二”,其主笔章士钊就是原《苏报》的主笔。同样,清政府与租界当局疏通,封禁了于右任办的《民呼日报》,但很快,《民呼日报》就出版了,主笔还是于右任,印报设备就是《民呼日报》的设备。这样变戏法,与其说是租界当局在对付革命党,还不如说是在应付清政府。难计其数的革命书刊,从海外、从上海源源不断地流入内地,这对于清政府的打击是致命的。从清政府角度看,在洋务运动时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就对新式媒体报刊重视不够,左宗棠甚至不屑一顾,斥新式报人为江浙无赖。戊戌变法以后,虽然有些官员看到了报刊的重要性,清政府也曾做过官办报刊的努力,但成效不大。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在自办报刊方面虽然比先前重视,至少办过一百多种官报,包括中央部门办的《政治官报》、《商务官报》、《学务官报》,地方政府办的《北洋官报》、《南洋官报》、《湖北官报》等,但这些报纸,或所办非人,经营不善,或理念陈腐,令人生厌,在理论创新、宣传气势上,都乏善可陈,远远不能与革命派抗衡。❶